海峡文丛 [方彦富 主编] HAIXIA WENCONG



寻根话语：
民族叙事与现代性

林秀琴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AIXIA WENCONG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XUNGEN HUAYU
MINZU XUSHI YU XIANDAIXING

寻根话语：
民族叙事与现代性

林秀琴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 / 林秀琴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11
（海峡文丛 / 方彦富主编）
ISBN 978-7-81130-369-8

Ⅰ.①寻… Ⅱ.①林 Ⅲ.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Ⅳ.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940 号

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

丛书策划/芮月英
丛书主编/方彦富
著　　者/林秀琴
责任编辑/顾正彤　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34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369-8
定　　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寻根话语的发生　013

一、暗　流　013

二、缘　起　019

三、语　境　024

第二章　观　念　034

一、根、文化与民族性　035

二、文化的“边缘”　039

三、文化的“结构”　042

四、“断裂”与“重铸”　045

五、文化的歧义或辨析　050

第三章　论　争　053

第四章　“民族国家文学”话语　064

一、主　体　064

二、民族、国家和“民族寓言”　067

第五章　民族文化认同的世界语境　074

一、“世界”的到来　074

二、全球化、文化霸权和认同危机　079

三、影响的焦虑　085

第六章　民族主体性的建构　090

一、根:被暗喻的民族　090

二、失落的民族主体性及其重构　093

第七章　叙事与修辞　099

一、“无父”之虑　099

二、“乡土”意象　110

三、“历史”叙事　120

四、“语言”之维　130

第八章　反思的现代性　142

一、反思的现代性及其可能　142

二、现代性话语的维度　146

三、寻根话语:作为反思的现代性 152

第九章 “城市/乡土”叙事 155

一、乡土:伦理与美学 155

二、回归的乡土 158

三、尴尬的乡土 161

第十章 历史和伦理 165

一、历史的进步及代价 165

二、历史与伦理的制衡 172

第十一章 启蒙和审美 175

一、启蒙的乡土 175

二、启蒙的寓言 180

三、审美的乡土 188

四、反启蒙的寓言 193

第十二章 可选择的现代性 198

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198

二、可选择的现代性 202

第十三章 结语或问题 207

一、民族叙事与本质主义的陷阱 207

二、乡土与失落的现代性 213

三、寻根话语终结了吗　215

附录　民族、本土、传统与文化重建　219

——台湾乡土文学话语和寻根话语比较

一、比较对象和可比性　219

二、文学传统:对现代派文学的反拨　221

三、社会语境:现代化的经验书写　227

四、世界格局:民族本位文化的诉求　233

五、本土化:民族文化认同与分离主义　238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7

绪 论

一

1985 年前后,有一批被命名为“寻根”的作家及其作品聚集了文学和文化界众多关注的目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批为数并不多的作家却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相当显要的地位,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阿城、莫言、张炜,等等,此后,文学史将这批作家的作品称之为“寻根文学”。但严格来说,这些作家和作品并未形成一种思潮体系,更不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创作主张和创作方法的流派。比较而言,把“寻根”文学看做一场文学运动而非文学派别来得更恰当些。这批作家和作品在短时间内的同步亮相,像是一次松散的文学聚会。但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文学群体,却分享着一些相同或相类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立场,他们风格各异的文学实践中贯穿着某种一致的社会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致被冠以“寻根”这样一个共同的名号。这一批作家和作品在当时饱受非议,但它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与位置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天,“寻根”文学在与历史、时代的互动中所建构的话语场域及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仍然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有意地避开“寻根”文学这一通用的概念而称之为“寻根话语”。

寻根话语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晚期引起激烈争论、调动起文学界和文化思想界众多力量参与和论争的重要文学现象之一。本书选择寻根话语作为观照对象,出发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寻根话语诞生于一个社会转变的关节点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经济为主导

的社会变革所触发的层面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所能辐射的疆域。现今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社会,在开放的世界视野中,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对时代和社会的观念、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进入了一个重塑和再造的崭新时期。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寻根话语恰恰是凭借着文学对时代的敏感性和对历史、文化的省思精神,积极介入了这种重塑和再造的历史行为。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的寻根话语所聚焦的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学审美的范畴(虽然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它的思考对象已经覆盖到民族、现代性、世界、全球化这些广泛而重要的问题。不可否认,这些问题正是构成我们当今社会现实思考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观察当今现实的重要视角之一。在当今的思想考察中,民族、现代性和全球化这些文化议题正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书旨在从"话语"的角度,考察围绕在"寻根"这一概念下的一系列文学现象,包括历史语境和相关论争、主要立场和文本实践等方面。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综合的考察,以描述寻根话语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种种互动关系,即相互"构成"的关系,阐发寻根话语对这些语境的理解和作用。

从对文本形式的考察来看,构成寻根话语阵容的作家基本上各自为阵,作品风格和艺术气质各一,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问题线索,也能发现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相互联系的形式特征,但是若要提炼出某种独特的文学派别特征,则可能导致过分牵强。这也是很难把寻根话语归入某个创作流派的原因。但笔者以为,这正是寻根话语的可取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文学流派最终丧失创造活力就是囿于门户之争与派别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寻根话语更多地秉持了文学独创性的自我意识。我们很难将韩少功、贾平凹、阿城、王安忆、莫言、张炜、郑万隆、乌热尔图等人的文章归为一种审美类型。我们不能肯定,韩少功《爸爸爸》对"鸡头寨"的现实主义描摹中是不是也混杂了某些魔幻或神性的味道;我们也不能断言,莫言《红高粱》中汪洋恣肆的色彩与情感的自由喷发是主要承传自中国民间文学还是西方现代派;阿城《棋王》也许沿袭了古典小说"白话"简约凝练的传统,王安忆《小鲍

庄》细腻殷实的笔触是否与此相逆？显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资源也好，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实验也罢，寻根话语在形式审美上的开放性，难以用某种创作风格进行化约。

笔者把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归入这本书的讨论范畴，并非源于这些作家声明自己是寻根派，也并非由于这些作家对寻根问题发表了哪些意向性的看法和论述。把这些作家和作品放在一起讨论，在于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视角与视野呈现出某些相似的气质——这是把它们归拢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事实上，富于创造力的作家既不满足于将自己的创作停滞于某种状态，更不愿意被归类为某种风格或者流派。本书中所论述的对象涉及众多富有个性的作家，更铺展至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文本，这本就不是容易和可以归类概括的事，简单的归类是不负责任，而负责任的归类显然又吃力不讨好。这些赘言旨在表明，这部书的写作，既不是作家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论，更大意义上是基于笔者对一段文学史的描述与理解，并试图尽力从自己的视角，对这一段文学史所提交的问题给予理解及定位。

二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二、三章是本书的“问题史”部分，旨在发现寻根话语发生、发展的线索，还原寻根话语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展开寻根话语的主要观点和相关的论争，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论述提供一个基本的“问题”语境。

从历史脉络来看，寻根话语可以看做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反思的深入。自新时期思想启蒙启动以来，对“文革”的反思和总结逐步扩展到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历史的反思，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寻根话语延续了这一使命，并把民族反思凝聚在民族文化的层面，民族文化成为寻根话语观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视角。从文本实验和形式探索的角度来看，寻根话语将文学审美的独立性置于重要地位。寻根话语对文学审美独立性的强调，一

定程度上受益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现代派文学使寻根话语开始关注“文本”,而不仅仅是“现实”,准确地说,寻根话语在传统的现实反映论、再现论之外,发现了形式层面大有可为的空间;另一方面,现代派文学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盛大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我们是否正在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中国版本?正是对民族文化审美个性的强调,人们开始反省并希望能够建设一种建立于本土语境之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反省是寻根话语产生的重要动力之一。寻根话语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民族文化审美的个性却没有拘泥于中国文学审美的既有传统,而是在一种更开放的文学审美格局中,将文化反思的开拓与审美形式的实验探索加以结合。

回到寻根话语所处的现实历史语境,20 世纪 80 年代以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孕育寻根话语的重要土壤。现代化运动创造了一个崭新而复杂的话语空间,它引发了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的变更。经济改革固然势如破竹,但历史沿袭的惯性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多重的阻力。更何况,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型社会的建设,对于久经动荡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跌倒、重复,然后又顽强前行,其中又有多少的纠葛、矛盾与对峙呢?对于敏感的作家来说,现代化运动提交的一批问题已经十分迫切地需要探讨和寻找答案。他们意识到,这一场社会变革并不仅仅停留于经济体制的更迭,事实上,它已经使得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伦理、启蒙与审美等价值范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裂变,这种裂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虚无感,但也暗示了一个价值重建的广阔空间。这显然是一片蕴藏着勃勃生机的废墟,它的重生有赖于调动整个社会的诸多力量,而文学固然也不愿放弃这片土地。

在这个部分,笔者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还原那些促使寻根话语发端的文学、文化与历史等多维的动力和机制,在此基础上,笔者阐述了寻根话语的文化理论架构及其主要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论争,以期在历史的追溯中回到文学的现场。1985 年前后韩少功、阿城、李

杭育、郑万隆等发表了一系列相互响应的文化随笔，这些文章提出了寻“根”的总体意向，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寻根话语的文学兴趣及创作立场，表达了寻根话语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问题的思考，我们大致可以从这些文章中勾勒出寻根话语的理论框架和创作路线。关于寻根话语的论争，本文选取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稍作阐述。笔者意在通过这些粗笔勾勒，表达作为“文学现象”的寻根话语的基本线索，它们将是本书所重点讨论的“问题”的重要背景。

第四至七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着重阐述寻根话语的“民族”叙事和“民族主体性”的建构。这一部分梳理了寻根话语从“文化制约着人类”的体认、“文化断裂”的焦虑、“对民族的重新认识”的呼吁，到“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到“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再到“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的理论线索。

在笔者看来，寻根话语表达了重新建构传统文化“同一性”和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愿望，以及立足于这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培育和树立独特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质素的文学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寻根话语既不是一种保守的僵硬的民族认同话语，也不是现代性冲动下的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开放与省思——寻根话语力图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民族”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建设的意义与空间。

另一方面，在一个敞开的“世界”语境中，寻根话语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某种程度上也被转译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侧重揭示寻根话语对“世界”语境——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权力关系的省察，以及寻根话语对“走向世界”冲动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警戒。寻根话语力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再认识、再创造，获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观照，并力图通过地域、历史、文化（传统）、语言维度的确立，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集体主体性的自我体认，以回应于

“世界”文化格局的话语权力,从而寻求民族文化和民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独立地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和民族主体性的建构,使寻根话语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开放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的一次重要的话语实践。在叙事上,寻根话语更多地呈现为类似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笔者把它称为“集体主体性”的叙事。因此,寻根话语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话语——某种意义上,“民族国家文学”话语已经形成中国20世纪文学的意识形态传统,寻根话语可以看做是这个传统的延续。

把寻根话语界定为文化认同的话语行为,就避不开“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主体”无疑是我们点击20世纪80年代文化、思想和哲学语境的关键词。李泽厚和刘再复在这场横跨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学史的讨论中分别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在李泽厚的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哲学阐述的背后隐藏着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革”和迎接改革开放的强大启蒙内心,那么,刘再复则试图使这种启蒙在文学领域成为可能;如果说李泽厚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那么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则暗示着,无论是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或是作为表现对象(人物)的主体,或者是作为读者的主体,其所共同构造的文本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磁场,对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具有某种话语权力。

这里有必要提到卡西尔的《人论》,这部1985年出版的中文译著使人们对主体的理解建立了新的角度。“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人首先转变为‘符号’,而世界则转变为‘文化’,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被归结为‘符号’对‘文化’的各种关系了。”[①]这意味着,主体是一种“文化”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人通过“文化”来建立主体性。很难说寻根话语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对寻根话语的作用显然不能忽略,寻根话语对“文化”的看重,乃至对“文化制约着人类”的强调,与卡西尔的理论也不能说没有某种联系。关键在于,寻根话语可能从这些语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序》,《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境中发现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广阔空间。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启蒙理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并由此建立主体认识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对主体的话语权力和文化的话语功能的重新发现——这些思想范畴对于寻根话语的主体建构及文化认同来说,既是重要的哲学基础,也是相当重要的维度。

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主体”、“主体性”概念的使用更多的是修辞性的,确切地说是比喻性的,而且也是策略性的。在文化认同的话语行为中,“主体”更像是一个超级能指,它附着于“国家”、“民族”诸如此类的共同体单位而获得话语的权力,主体性的建设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机制。笔者要强调的是,把寻根话语界定为一次文化认同的话语行为,无疑是本书对寻根话语的一次再建构——既然我们笼罩于符号之下,话语无处不在——同时,笔者从寻根话语中提炼出来的各个范畴,譬如历史、文化、语言,包括寻根话语最终的“民族”指向,等等,毫无疑问是“话语”性的,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这些范畴是话语性的,但是在寻根话语中,它可能更多地被视作是“本质”性的,“本质”是主体建构的基石;第二,这个事实并不妨碍寻根话语文化认同建设的有效性,因为所有的文化认同都必然是“话语”性的,且又都求助于这种“本质”性的阐释,寻根话语遵循的正是文化认同的话语机制;第三,也正是在“话语”的意义上,寻根话语的主体建构才具有了相对于“世界”——它同样是“话语”的结果——的意义,即在“世界”的话语权力角逐场上,争取民族话语的独立身份和自主性。

第八至十二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把重点放在寻根话语的“乡土”修辞上,寻根话语通过城市与乡土的对比性话语确立了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伦理、启蒙与审美等二元维度,并以此开启对现代性的文化思考和文学实践。现代性显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民族、国家、全球化、民主运动、人权组织、女性主义……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上个个都显耀夺目,同时,现代性又如此细腻具体、无所不在地渗透和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中。本书第二部分所探讨的“民族”话语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而且,寻根话语通过潜意识、深层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所确立的民族主体性,是回应于“世界”(事实上的

“西方”,全球体系的垄断者)这个强大的“他者”,而这个“他者”在当代最为重要的实践,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被阐释为体现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现代化—现代性”这一总体方案。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源自西方的传统。① 借助全球化体系的演进,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占据了经济与文化的双重霸权,“现代性”方案作为一种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已经移植到西方之外的众多族群或民族、区域或国家,开发出一片广阔的“后发现代化”的处女地。在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催化下,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走向现代性是发展的必然选择——对自身“前现代社会”身份定位的接受,说明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已经内置为东方国家的自我意识——而这很显然也是“西方”所乐见的结果。

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传统与东方文化传统——出于表达的策略性考虑,我们权且认为存在着两种相对完整、独立的“西方”和“东方”,至少是作为话语身份的传统——当这两种具有众多异质性的文明景观相互遭遇,二者之间必然生发出极其复杂的关系。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在进入东方本土之际,文化之间的侵入与反抗、冲突与较量、淘汰与融合,必将构成强大的话语权力角逐场域。的确,两种文化的权力有强有弱,但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不一定就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可能更多地在相互调适中寻求某种公共空间——西方以此寻求“准入”的通行证,而东方则以此划出自我保护的界线。两种文化的角逐充满着种种变动与复杂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将发现,东方本土的文化传统与原本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相互“改写”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一个多样化、本土化的现代性话语。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振兴,“儒家现代性”被提上话语讨论的议程,正是东方国家对现代性话语给予重新整合的重要个案。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实践现代化—现代性社会发展方案的早期阶段,现代的生活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工业化、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 152 页。

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市场经济正在形成,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呼唤,对进步理性主义的信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想象的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这种秉承自西方、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现代性话语,正在深刻地塑造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思想语境。

寻根话语对这个社会历史语境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沉浸于历史悠久的强大的乡土文明之中,而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现代化进程,则使得"城市"成为崛起的新生事物,在现代化运动这样一个重型历史挖掘机的碾压下,乡土文明在被推倒的步步溃败中渐行渐远。那么,乡土文明是否真的就一无是处?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是否就一定水火不容?如果说乡土文明承载了厚厚的沉疴痼疾,而城市文明也正日益流露出浮躁和浅薄,那么,在这一场文化角逐中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本土经验的重要方面,也启发了寻根话语对现代性话语的审慎立场:他们发现,现代性话语并不总是符合人们的道德理解、伦理期待和审美理想。

事实上,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歧,二者的对立与矛盾实际上是现代性自身复杂性的体现。从启蒙运动以来,对科技理性和现代文明的建设同时伴随着对它们的质疑。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一书中勾勒了18世纪以来自德国浪漫派开始的对现代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延续下来,成为与现代化话语传统相抗衡的另一支传统,即反现代化的文化传统——有时,这种关系被看做是启蒙现代性传统和审美现代性传统的分歧和对立。与启蒙现代性对工具理性和进步主义的强调不同,审美现代性通过对自然、感性、美学的强调,寻求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工具理性过分膨胀的方式,抵抗科技理性、现代文明对人的重新异化。换言之,通过对"人"的全面发现,来对抗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竞逐与互动构成了现代性内部富于创造性的话语空间,即"反思的现代性"空间。或者说,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话语自身已

经发展到了需要自我反思并正在进行反思的阶段。“反思的现代性”使现代性话语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纷争成为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这样,利奥塔所宣称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终结,与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现代性尚未终结,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如果它们事实上存在着的话——就会迎刃而解,因为二者事实上都表达了现代性话语的部分真理性,或者说,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现代性话语的不同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曾有过“新启蒙”与“后启蒙”的争执,一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端一样。实际上,这些论争归根结底都围绕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争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因此,安东尼·吉登斯才把后现代性话语看做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阶段。对审美现代性的强调则有力地制约了启蒙现代性的负面价值,提供了一种对启蒙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必要反思——借用安德鲁·芬伯格的修辞,现代性是“可选择”的——在笔者看来,“可选择”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如何寻求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平衡。

我们可以发现,寻根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特别是审美现代性话语有着深刻的源脉关系。如果说启蒙现代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工商文化和市场价值的肯定,寻根话语则重新阐述了乡土文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启蒙现代性倡导了一种前进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现代优于传统的价值关系,那么寻根话语则认为“过去”和传统对于现代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说启蒙现代性发扬了科技理性,那么寻根话语则注意到了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并由此建立了“自然”的和审美的价值意识。从寻根话语的理论建构和文本实践来看,寻根话语对乡土文明所能承载的审美现代性寄寓了深刻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寻根话语将乡土文明与审美现代性简单地等同起来。事实上,寻根话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在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伦理、启蒙与审美等维度上,展现了文化的复杂性和文化选择的两难境遇,在审慎的批判与开放的视野中呈现出可贵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这使之与某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守旧主义或同样盲目自大的文化革命主义清晰地区别开来。寻根话语赋予乡土以伦理和美学的价值,以